

商 务 印 书 馆

主 编 刘 东

中國學術

总 第三十一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10 No.1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

中國學術

送金



总第三十一辑

主编 刘 东

商 务 印 书 馆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 总第 31 辑/刘东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247-0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 第 13479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封面题签 饶宗颐

ZHONGGUO XUESHU

中国学术

总第三十一辑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247-0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31 插页 1

定价: 36.00 元

执行编辑 岳秀坤(北京大学)

李丹婕(清华大学)

通讯编辑 戴沙迪(马萨诸塞州立大学)

古 柏(芝加哥大学)

张 伦(赛尔齐·蓬多瓦兹大学)

蔡慧清(伯克利加州大学)

李冠南(道临学院)

赵 坚(常磐会学园大学)

达素彬(弗赖堡大学)

助理编辑 何 恬(中国社会科学院)

彭姗姗(北京大学)

刘 玮(中国人民大学)

李 洁(中华女子学院)

方 麟(清华大学)

投稿地址: 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文史室《中国学术》

电子邮件: dongliu@pku.edu.cn

或 ChinaScholarship@vip.sina.com

网 页: <http://chinascholarship.vip.sina.com>

订购地址: 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发行部

电 话: (010)63044891 83164425

卷首语

补写这篇文章之前,刚沿着长长的三亚湾,进行了例行的散步。精巧的现代发明——随身听,向耳中送来了巴赫的《平均律》,那乐声平缓而富于变化,典雅又贴合人情,纯净却绝不空泛,从来都能把我带入忘情之境……然而刚才,这缓缓流动的钢琴声,偏跟滚到脚边的海涛,断断续续地交响了起来,无意间构成了意外的效果,让自己顿时打了个激灵!——呀,你听:那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涛声,淘尽了天下的多少英雄,就连海洋中傲岸的礁石、还有各种生物的甲壳骨骼,都被撞碎成了松软的沙滩!可是毕竟,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抵御住时光的磨洗,那就是精诚所至的人类文化,恰如此刻正漫过涛声的乐思。

这种既让人感动、又让人敬畏的对于文化的信念,不正是一直在秉持和追求的吗?想到了这一点,原想要放松心情的散步,就变成了对精神状态的澡雪,把自己清新焕然地带回到书桌,——且不论新一轮的学术成果,是否当得起上述那种分量的比对,先在这种庄重的心情下,汇报一下晚近的思索内容吧!

论文档第一组,聚焦于西方政治哲学,且都立足于文本细读,去寻绎理想与现实的关联。费拉里重新审视了《理想国》对美丽城(Callipolis)的构想,并着重回顾了柏拉图如何用精巧的构思和设计,来引入和展开三项改革措施、尤其是哲学家王的统治,并以此来展现它何以是最理想的城邦。作者提出,柏拉图并未书写更加具体的内容,是因为在他的这个人生关口,最关心的实践手段正是写作本身;但反过来说,这种具有高度技巧的“作家式的”方式,其本身就有助于促成理想城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乌托邦主义又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徐向东考察了世界主义正义观的倡导者阿

马蒂亚·森和玛莎·纳斯鲍姆对于罗尔斯的一些关键批评,却又认为那主要立足于对罗尔斯的误解;这种误解的产生,在作者看来,又主要是因为批评者们未能恰当理解罗尔斯对一个理想的正义理论的设想,以及他对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之关系的论述。借助于这种区分,罗尔斯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尽管当政治哲学家试将其构想出来的理论应用于社会现实时,不能只去立足于乌托邦式的考虑,但他们仍需持有一个适度超越社会现实的正义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说——“政治哲学,当它扩展日常被认为是实际的政治可能性的限度的那种东西时,是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第二组的两篇,聚焦于现代文学中的鲁迅,且都立足于比较的视野,尽管其出发点大不相同。刘东继续追问明恩溥与鲁迅之间的影响—接受关系,并以超长的篇幅解析了沿着这种关系的一连串误读。首先,当然是明恩溥误读了中国:尽管他对某些中国下层文化心理不无所见,但就算他看到了这些中国事实,却又因先入之见而未能认清它们,看不到中国文化原有大、小传统之分。其次,又是鲁迅误读了明恩溥:尽管当年很多人阅读和聆听过后者,却唯有鲁迅才仅仅从中抓住了负面,遂把在传教士那里还是优劣参半的国民性话语,简单地等同于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读解方式,正说明其前理解形成于阅读之前,更与他本人的心性、气质和选择有关,尤其跟被明恩溥所忽略的、中国文化自有的大传统有关。接着,则是刘禾误读了鲁迅:她的贡献当然在于率先把鲁迅研究带入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使得在明恩溥和鲁迅间的、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影响—接受关系,乃至在鲁迅那里至关重要的国民性话语,都突然成为问题和引人怀疑了;可惜,在进行这种论证的同时,她又把善恶二分法的一极分给了坏人明恩溥、另一极分给了好人鲁迅,由此便压缩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使作者留给自己的解释空间变得狭小。最后,文章又借用鲁迅晚年的表述,来表达作者本人的质疑:“这种在中国文化史上绵绵不绝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究竟又属于怎样的一批人呢?——难道不正是(或者主要是)读过圣贤书籍、受过儒家教化的人么?那么他们的文化心理到底属不属于所谓国民性?难道就连这样的国民性也必须放到

铁砧上去改造么？而且，有了这样的国民性，或者至少是国民性的组成部分，所谓的国民性还仅仅只是国民劣根性么？……”但同时，作者也愿把鲁迅归入那群“埋头苦干”的人，因为就算他开出过错误的处方，仍是在为中国的前途而“拼命硬干”的。由此吊诡地是，虽然鲁迅那么厌恶中国文化，还是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传统。相形之下，张丽华对这种“拿来”手法看得更为积极，她以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为例，将它与格式相似的俄国作家安特来夫的小说《心》进行对读，以呈现鲁迅对域外文类的挪移与转换。作者认为，《狂》明显模仿了《心》的格式与构图法，但又对其主人公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根本的倒转：《心》的主人公是一个自绝于外部世界的无限扩张的自我意识；《狂》却放逐了对“狂人”的内面世界的直接描写，而将“狂人”的自我意识建立在与周围世界的看与被看的相互关系中，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批判视角。由《狂》所奠定的这种主人公与外部世界相互对象化的构图，成为鲁迅此后小说的重要风格化特征，也深刻影响到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第三组的两篇，继续处理俄国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艾琳·凯利指出，以赛亚·伯林对亚历山大·赫尔岑的特别关注，能帮助我们理解他那不同于主流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论。这两位思想家都在追求个人自由，然而共同的俄国出身，却让他们更多地认清了那些处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群体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所以，相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赫尔岑更早地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人类价值观的多元性，可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又并未放弃政治信仰，而能继续过一种统一、连贯且值得钦佩的道德生活，这让后世的伯林追慕不已。龙瑜成指出，由于二十世纪中俄两国间的特殊政治联系，俄罗斯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其本国的命运变化，势必一次次地在中国激起奇特的回声：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入中国的陌生与多义，到战争年代引发共鸣与误读，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被推为摹仿的典范和设为翻译的禁区，而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迅速隐没……这一声声“两次革命间的回响”告诉我们，马雅可夫斯基的个人悲剧不仅上演在苏联，也同样上演在中国，因为当人们有兴趣阅读他时，其最好的诗作根本就不准阅读；而等大家可以随意阅读这些作品时，他们又基本上失去了阅读他的兴趣。

第四组的两篇,聚焦在对于巴别塔的建造。陈力卫试从语言史角度来考察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文章前半部分考察了至今未被关注的1900年《和文汉读法》的励志会版,试图据此复原早期版本的原始状态,并阐明不同版本演变的源流;后半部分考察了“和汉异义字”的增补方法,并通过检讨它与日本近代国语辞典《言海》(1889年)的关系,来阐明《言海》在《和文汉读法》词汇增补和释义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在“同文同种”的意识下,中国人对“和汉异义字”的理解,特别是对日语新词新概念的认识;进而了解日本明治时期使用的一些译自西方的新词,是如何随着《和文汉读法》的运用而大量流入汉语的。由此可知,梁启超等人主要依赖中日间的“同文”特征,凭借自身的汉文能力来竭力理解日语,希望尽快从日文中汲取大量新概念,结果也难免产生一些消化不良的接受认识。由此,还有必要站在更开阔的视野上,来再次讨论《言海》在中日语言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孟凡礼作为更加精准的后起译者,回顾了单独围绕穆勒《论自由》这一本著作的翻译史。这本为个人自由进行辩护的小册子,在西方就堪称政治哲学的经典;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它又因严复的翻译变得愈发重要;而在国际汉学的脉络中,它更因史华兹对于严复翻译的著名解读,变成了至关紧要的解释对象。正因此,整个汉语世界才由严复、马君武、许宝騄、郭志嵩、顾肃、孟凡礼等人付出了持续的努力,来不断进行对此部名著的消化,真可以说是“百年磨一剑”了!

访谈栏中,发表了对多罗西娅·弗雷德(Dorothea Frede)的访谈。这是一位蜚声世界的古典哲学专家,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晚期希腊哲学方面著述甚丰,也是重要的海德格尔研究者。本刊的编辑趁访学之便,专就其治学经验和有关古典哲学的某些整体性问题向她讨教,又同她探讨了古典哲学研究的不同模式、古典哲学教育的过去与现在,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中的热点与重要问题。此处将其以《不同传统的融合》为题发表出来,是因为这种宽阔的态度正好可以概括她的学风,比如她所说的“至于图宾根学派和施特劳斯主义,我恐怕没有什么好话可说。首先我对于宗派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宣称‘我们知道了真理,而其他人不知道’,这种想法跟我是

不相容的,而这两个学派都这样做”,就表现出了这样的风度。

评论栏两篇,反思了古今人群的不同整合努力。杜赞奇试图勾勒与“帝国”、“帝国主义”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相关的概念、历史、理论及争议,从而呈现与此相关的各种复杂图景,以此为理解当今世界政治提供知识地图。文章首先通过概念分析,强调了现代帝国主义在海洋扩张和殖民主义之外,尚以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其前提;其次回溯了帝国主义研究的学术史,分疏了自1902年霍布森以来,中经列宁发展,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再到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论,后逐步出现“后宗主国中心主义”转向(post-kmetro-centric turn),再到以萨义德和查特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演变;再次,勾勒了发端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发展史,并就其与工业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共同发展中的互相影响及其在全球各地的多种表现进行了论述;最后,介绍了二十世纪中期现代帝国主义发生的转变,由于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分割世界权力体系的争夺,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不仅包含了老牌的欧洲势力,还包括诸如日本、美国等新势力——这个阶段可称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而二战后的美国则代表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峰。作者认为,新帝国主义竞争被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因素的独特配置所激发,其民族主义基础使之很难建立起联邦政体、经济合作体、甚或“帝国”。当今时代的全球化和地区形成或有诸多特征,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间的纠结,将会持续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吴震首先回顾了近十年来东亚儒学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指出“东亚儒学”既是东亚地域存在的一种历史事实,又表现为该地域的一种文化概念;进而聚焦于儒学与东亚间所呈现的普遍与特殊的张力问题,指出17世纪以来东亚地域文化有趋同也有差异,而儒学的理念及其价值亦既有普遍性之表现,又在不同文化历史中呈现出殊异之处;最后指出在当今世界文化日趋多元的背景下,要注意“儒学价值观”或“亚洲价值观”的提法或有可能变相为一种“一元论”论述,成为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对抗性论述。

完成了上面的汇报,尽管每篇成果都很用心,但在最初提到的那个涛声的意象下,却不敢有一丝的志得意满。事实上,正因为必须紧紧抓住深层,

学术生涯才更显出其残酷的一面，它既要求你必须有一肚子学问，否则就无法达到它所要求的深刻性，却又不因为谁获得了满腹经纶，便额外多给他一天的光阴。——正相反，恰因为必须长久地伏案用功，才有可能得到那一肚子学问，所以时间的涛声，反而会因为谁更在学业上不惜力，就更加无情地磨洗你，恨不得把你周身的筋骨，都磨碎成摊在海边的沙砾。正因此，我才在悼念魏斐德时如此大放悲声：“绵绵无尽的学术事业，竟这么残酷这么森严，这么一言不发着，可那中间流淌的，却都是古往今来的英雄血呀！”

此刻，再俯身回望那轰然作响的海浪，还是只顾从大海的幽深之处，日复一日地朝脚下卷来，又很难不在这一片蛮荒的空旷中，产生出郭小川在《望星空》中的慨叹：“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同样是因为，你必须紧紧抓住深层，学术生涯就比任何其他志业，都更容易让它的从业者体认到，此生只享有相当有限的自由。——你并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便去力挽脚下的无边狂澜，因为你的力量还只是一种思想，它对于不习惯思考的头脑来说，还几乎就是不存在的……

然而，这种有限自由又是何其宝贵的！它至少可以让我们站在大海边，选择礁石般屹立的昂扬姿态。于早岁就曾经这样写道：“即使一个先天不足的后学眼下还很难用思考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也仍然有责任以这种殚思竭虑本身来替他的同辈说明一点儿什么，——或许借笛卡儿那话来说，正是：我们思，故我们在！”而眼下，在历经了二十八年的风雨之后，就让我重新把它表述一遍吧：就算终究不能彻底力挽狂澜，也要把思考的轨迹遗传给后人，以证明自己确实存在过、思考过……

至少这种不死不灭的信念，它必会是千古不磨的！

刘 东

2012年1月18日

于三亚湾双台阁

目 录

卷首语	1
-----------	---

论 文

费拉里 柏拉图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	1
徐向东 罗尔斯的现实主义乌托邦——兼论森和纳斯鲍姆对 罗尔斯的批评	16
刘 东 多重误读下的国民性话语——以汉学史中的明恩溥 为主线	80
张丽华 文类的越境旅行：以鲁迅《狂人日记》与安特来夫 《心》的对读为中心	150
艾琳·凯利 伯林与赫尔岑论自由	181
龙瑜宸 两次革命间的回响——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	198
陈力卫 “同文同种”的幻影：梁启超《和文汉读法》的改版 过程与日本辞书《言海》	235
孟凡礼 穆勒《论自由》的汉译版本比较——为什么要重译 这本书？	271

访谈/通讯

多罗西娅·弗雷德/刘玮 不同传统的融合： 多罗西娅·弗雷德专访	299
--	-----

评 论

- 杜赞奇 现代帝国主义 325
- 吴 震 “东亚儒学”刍议——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为核心
..... 345

书 评

- 詹姆斯·C. 斯科特:《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山地的无
政府历史》(何江穗) 406
- 舒喜乐:《人民的“北京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众科学与
人类身份》(蔡慧清) 412
- 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黄小峰) 419
- 吴妙慧:《声与色:永明时期的诗学与宫廷文化》(蔡丹君) 431
- 葛以嘉:《戏王之王:1870至1937年间京剧重塑中的演员与
公众》(魏艳) 439
- 叶凯蒂:《上海之爱:妓女,文人与娱乐文化,1850-1910》
(林峥) 445
- 罗宾·基尔:《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文化误译不可避免?》
(赵坚) 451
- 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张治) 457
- 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王化雨) 464
-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高珂立) 473

Contents

Preface	1
---------------	---

Articles

G. R. F. Ferrari, Plato's Writerly Utopianism	1
---	---

Xu Xiangdong, John Rawls's Realistic Utopia, and Amartya Sen and Martha Nussbaum's Criticism of Rawls	16
--	----

Liu Dong,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Character amidst Multiple Misunderstandings: Taking Arthur Smith as Its Main Thread	80
---	----

Zhang Lihua, Transfiguring the Genre: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Lu Xun's <i>The Diary of a Madman</i> (1918) and Andreev's <i>Thought</i> (<i>Mysl'</i> , 1902)	150
---	-----

Aileen Kelly, Berlin and Herzen on Liberty	181
--	-----

Long Yucheng, Echoes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Mayakovsky in China	198
--	-----

Chen Liwei, The Illusion of "Same Character, Same Origin": The Editing of Liang Qichao's <i>Chinese-Japanese Handbook</i> and Japanese Dictionary <i>Yan Hai</i>	235
--	-----

Meng Fanli, Comparing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John Stuart Mill's <i>On Liberty</i>	271
---	-----

Interview/Correspondence

- Dorothea Frede/Liu Wei,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Traditions:
An Interview of Dorothea Frede* 299

Reviews

- Prasenjit Duara, *Modern Imperialism* 325
- Wu Zhen, *Discussion on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ty and Peculiarity* 345

Book Reviews

-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He Jiangsui) 406
- 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i Huiqing) 412
- Wu Hong, *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Huang Xiaofeng) 419
- Goh Meow Hui, *Sound and Sight: Poetry and Courtier Culture
in the Yongming, 483 – 493* (Cai Danjun) 431
- Joshua Goldstein, *Drama Kings, 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 1870 – 1937* (Wei Yan) 439
- Yeh Catherine,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 – 1910* (Lin Zheng) 445
- Robin D. Gill,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Is the
Mistranslation of Culture Inevitable?* (Zhao Jian) 451

Zou Zhenhuan, *Missionary and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History
in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Zhi) 457

Hirata Shigeki, *Political Structure during Song Dynasty*
(Wang Huayu) 464

Huang Kuanchong, *Clan and Society during Song Dynasty*
(Gao Keli) 473

柏拉图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

费拉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如果说柏拉图在写作《理想国》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乌托邦主义理论性太强,因而不能被称为圣战般的(*crusading*),但它毕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以某种特别的作家式的方式表现出来。下面的内容就是要解释和确证这些说法。

我会将目光集中在始于第五卷首的论证上,苏格拉底的对话伙伴要求他更详细地论述一个问题,他们感到他之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足:苏格拉底提出护卫者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共同的。这个论证贯穿第五卷和第六卷的大部分,它的最终结论是,要是为理想城邦构想出来的社会结构能够实现的话,确实是最理想的,而且它的实现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502c)。

苏格拉底很早就引入了在构想的最优性与可行性之间的区分,但是这个区分随后将他置于某种尴尬的境地,为了应付听众的要求,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构想既是为了最好的结果,又是可能的。苏格拉底在 450c 做出了这个区分。他预见到自己即将提出的关于护卫者共同生活的构想会遭到抗拒,于是将可能的反对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可行性的怀疑,另一类是关于它若真能实现是否确实为最好的结果的怀疑。

苏格拉底的区分似乎暗示他会不偏不倚地处理这两种怀疑,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接下来的长篇论证中,柏拉图在让苏格拉底表明美丽城(*Callipolis*)为什么是最好的城邦方面花费的精力显然远远大于表明它是否以及如

^{*} 本文是作者在 2010 年 8 月于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柏拉图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G. R. F Ferrari, "Plato's Writerly Utopianism")。

何可以实现。这一点似乎反对我的主张——柏拉图持有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事实上它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在苏格拉底所谓的论证的三个“浪潮”中的第一个,他花在讨论改革是否可能上的时间确实比是否为了最好的结果更多。但是我们要注意他是如何研究可能性问题的(452e-456c)。在论证的这个部分,他没有考虑用什么手段可以让女性也成为护卫者,也没有考虑事实上是否有什么可行的手段。他这样来解释这一构想是否可能的问题:女性的自然[本质]是否能够和男性分担所有工作,或者一些工作,或者没有任何工作?(*ei dynataē ou*[是否可能……]的问题变成了 *ei dynatē physis hē anthrōpinē hē thēleia*...[女性的自然是否可能……]的问题,452e-453a。)苏格拉底令人满意地证明了女性确实能够和男性分担所有工作,因此也就包括护卫者的工作,他这样总结道:我们毕竟不是在对不可能的东西立法,因为我们订立的法律符合自然(456c)。之后他又补充说:事实上反而是我们社会中女性的状况,也是与我们提出的法律相反的状况,才是违背自然的。

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关于这项改革可能性的论证就与是否可以实现无关。他论证的毋宁是这一改革并非荒诞不经,不管它在那些不能超越习俗的局限来思考问题的人看来是多么可笑(452a-d)。从更积极的方面看,他论证的是这项改革很有意义。这个构想很可能要面对充满嘲讽的敌意,但这本身并不构成认为它很容易付诸实施的理由。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指出女性在社会中的当前状况违背自然时表现得非常清楚。很显然,某种违背自然的状况很可能是现实中流行的状况。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实现苏格拉底的构想,那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构想符合自然,而是在论证可能性之前提到的那个过程。他指出,希腊人不久以前还认为男人像外国人那样赤身露体地锻炼非常可笑。但是经验表明了这一实践的优点,于是人们最终忘掉了他们的羞耻感(452c-d)。在女性为了战争接受裸体训练的问题上,我们也可以预见同样的情况(457a)。但是当